

文 化 县

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

[丹麦]曹诗弟 (Stig Thoegersen) 著
泥安儒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文 化 县

——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

[丹麦]曹诗弟(Stig Thoegersen) 著

泥安儒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

[丹麦]曹诗弟(Thoegersen, S.)著;泥安儒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

ISBN 7-5607-2916-9

I. 文…

II. ①曹…②泥…

III. 教育事业-概况-邹平县

IV. G527.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3065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5 印张 271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 册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中文版序

我写《文化县》的初衷是打算向中国以外的读者介绍中国引人注目的教育历史。现在，中译本就要出版了，它将使以学生或以教师身份亲身经历过我所讨论的那些历史变迁的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一个外国人是如何阐释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从表面上看，现代教育在世界各国都有一些非常相似的经验。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儿童们坐在教室里，学习阅读、写作和算术，他们也要接受有关本国和世界历史、地理知识的教育。通过这一教育过程，他们被塑造成国家的公民。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但在国与国之间，公民社会化的具体方式还是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即便是在文化比较相似的欧洲国家内部，你也可以在各国的教育制度，特别是所谓的学校“精神”之间，发现它们彼此的显著差异。所以说，研究教育也就是研究深深地植根于教育背后的文化规范和习俗。

参观中国的教室并与众多中国人谈论他们的求学经历，是我深入了解中国并探讨中国人思考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式的一次绝佳机会。当然，可能有些中国读者会不同意我书中的某些观点，但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我试图尽可能地如实反映邹平学生

是如何经历 20 世纪这些教育变革的。同时,我也特别欢迎能够得到来自中国读者的批评指正。

感谢山东大学的泥安儒副教授,他不仅帮助我完成了在邹平县的实地调查,而且将这本中文版的《文化县》奉献给了中国的广大读者。

最后,感谢奥尔胡斯大学的张纯老师,她帮我进行了大量的中英文校对工作。感谢米克荣编辑和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其他有关人员,《文化县》的顺利出版也离不开他(她)们的辛勤劳动。

曹诗弟(Stig Thoegersen)

2004 年 12 月于丹麦奥尔胡斯大学

致 谢

非常感谢山东大学的刘玉安教授,他在邹平帮我安排了第一个调查点。非常感谢山东大学泥安儒副教授,他同我一起三次到邹平进行实地调查,他在中国教育和乡村社会领域的专业知识、他的无比热情和耐心以及他成长于山东乡村的个人经历,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非常高兴能与他们二位结为朋友。

在邹平,我得到了县外事办公室和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友好地接待了我。当然,我还要特别感谢为我提供资料的被访者们,他们常常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帮我重现通常是发生在数十年前的事情。

丹麦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Danish Research Council for The Humanities),丹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Danis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奥尔胡斯大学研究基金(The Aarhus University Research Foundation)和奥尔胡斯大学周年纪念研究基金(the Aarhus University Jubilee Fund)为我的调查项目提供了经费,并为我争取了一年(1994~1995年)的离职研究时间,使我同家人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The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度过了愉快的一年。在堪培拉,乔恩·安格(Jon Unger)和陈

佩华(Anita Chan)使我一家四口觉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温馨自在。

我关于邹平研究的部分成果曾有幸在芝加哥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专家讨论会上被讨论过。感谢艾恺(Guy Alitto)和郝瑞(Steve Harrell)的热情帮助,感谢他们在讨论会上提出的宝贵建议。陈佩华、索伦·克劳森(Soren Clause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韩美德(Mette Halskov Hansen)、格兰·彼得森(Glen Peterson)和乔恩·安格阅读了部分或全部手稿,他们和密西根大学出版社的两位不具名的读者都给了我许多宝贵意见和莫大鼓励,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中国的教育与社会政治变革	(3)
第二节 教育改革释义	(5)
第三节 农村教育中的国家和地方社会	(10)
第四节 教育与当地经济生活	(12)
第五节 关于邹平	(14)
第二章 传统教育	(20)
第一节 传统小学	(21)
第二节 义 学	(30)
第三节 书院和考试	(32)
第四节 19 世纪末的传统教育与乡村社会	(37)
第三章 培养顺民:晚清新式学校的传入	(44)
第一节 晚清的教育改革	(45)
第二节 邹平最早的新式学校	(49)
第三节 周村的新式学校	(52)

第四节	师资培训	(53)
第五节	职业和成人教育	(56)
第六节	教育经费	(57)
第七节	教会教育	(59)
第八节	清末教育改革的局限	(61)
第四章 为了民族和进步:新式教育的起步(1911~1931 年) ...		(67)
第一节	学制和课程的改革	(69)
第二节	邹平的小学教育	(72)
第三节	中等教育和长山中学	(75)
第四节	职业和民众教育	(80)
第五节	教育扩展中的官员和当地精英	(82)
第六节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邹平教育:一个评估	(88)
第七节	职业与生涯	(93)
第八节	结 论	(99)
第五章 教育创建新社会:乡村建设运动(1931~1937 年)		(108)
第一节	梁漱溟的教育和乡村建设思想	(109)
第二节	小学教育	(114)
第三节	张宗麟和师范学校	(122)
第四节	成人教育和乡村社会的建设	(126)
第五节	从地方教育的角度看乡村建设运动	(134)
第六章 回归基础: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的学校(1937~1948 年)		(142)
第一节	传统学校的复兴	(143)
第二节	抗战时期共产党在学校中的影响	(144)
第三节	共产党控制区的学校	(151)
第四节	国民党控制区的学校	(156)

第五节	日军控制区的学校·····	(157)
第六节	战争期间的入学人数:一个估计·····	(158)
第七节	总结:1949年前邹平的学校教育·····	(160)
第七章	为新政权服务的教育(1948~1957年)·····	(167)
第一节	学校制度的重建·····	(168)
第二节	成人教育和识字运动·····	(180)
第三节	教师和中国共产党·····	(184)
第四节	结 论·····	(192)
第八章	培养革命接班人:极“左”时期(1957~1976年)·····	(199)
第一节	教育的扩展·····	(200)
第二节	极“左”政治与教育·····	(212)
第三节	教育和劳动·····	(217)
第四节	极“左”教育政策的遗产·····	(232)
第九章	为经济改革服务的教育:后毛泽东时代·····	(240)
第一节	打破“文革”模式:中等教育的重建·····	(241)
第二节	精英主义与竞争·····	(244)
第三节	全民教育: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	(248)
第四节	教师和教学方法·····	(253)
第五节	教育为农村发展服务:又一次努力·····	(262)
第六节	教育与职业生涯·····	(268)
第七节	21世纪前夜的邹平教育·····	(272)
第十章	结 论·····	(280)
第一节	邹平学校教育的扩展·····	(281)
第二节	国家、教育改革和地方参与者·····	(283)

第三节 教师及教学方法·····	(285)
第四节 邹平的教育和经济生活·····	(288)
附录 资料来源·····	(292)
参考资料·····	(303)
译后记·····	(322)

第一章 绪 论

在山东省邹平县城一个繁华十字路口的中央，在黑色大理石石基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身着长袍的人物塑像，他就是当地最杰出的历史人物——范仲淹（989～1052年）。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和军事家。他所致力事业使他走遍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他在邹平受过教育，他关于学习和读书人社会义务方面的思想在今天的邹平仍非常受人尊崇。在邹平，有关范仲淹的传说是邹平学校教育的最古老的记传，它描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理想形象——一个贫穷而有天分的少年通过刻苦不懈地研习“四书”、“五经”，从而功成名就的故事。

范仲淹四岁时，随母亲和继父来到邹平。其继父想让其学习商贾技艺，但他不喜欢，而是选择了在醴泉寺借读。白天，如果和尚们诵经打扰他学习，他就跑到山洞中去学习。传说，醴泉寺僧怜惜范仲淹读书勤奋，就每日省一块饼给他。一日，寺僧又给了他一块饼让他带到山洞里吃，但他读书太入迷以致忘了吃饼。突然，一只老鼠溜进来偷走了他的饼，范仲淹追至寺旁大荆树下发现：“旁有洞，掘之，石板下有黄金一窖，其西有白银一窖。仲淹毫不动念，掩覆如故。后登相位，醴泉寺倾颓，寺僧念旧日情好，赴京师求为资助。仲淹招待尽善，唯不言修寺事。临行，赠茶叶一包，寺僧

不悦而归。不久,长山县令来访。拆茶包时,见一纸条上书四句:‘荆东一池金,荆西一池银;一半修寺庙,一半赠僧人。’寺僧大喜,按迹寻之,果得。寺得再兴。”^[1]

范仲淹的故事主要说明了全身心致力于研习儒家经典会怎样为一个人带来锦绣前程,同时也说明了帮助一个有天分的孩子求取功名终会善有善报。因为受助人有道义去帮助那些曾帮助过他的人。但倘若范仲淹违反了任何其他的高高原则而去帮助那些和尚,这个故事就不会那么完美了。如前所述,他只是以自己的见识向那些对自己有恩的人表明,他们本身就有资源解决面临的问题。儒家学者的责任是以全社会为己任,正如范仲淹那句刻在大理石基座上的名言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俯瞰邹平县城的山坡(邹平黄山——译者注)上,我们可以看到与邹平教育有关的另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梁漱溟(1893~1988年)的墓碑。梁漱溟,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以邹平作为其“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基地。梁漱溟将自己看作是正统儒家思想的宣扬者。他和他的同仁抛开前景美好的城市生活转而深入到远离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农村,这可以看作是范仲淹所倡导的儒家思想的实践。然而,他们的到来也意味着中国乡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意味着邹平县的教育也将不得不适应20世纪的现实。这些城市知识分子胸怀壮志,他们想通过建立乡村学校推动社会变革,并且带去了新的教学方法、科学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

范仲淹和梁漱溟今天在邹平有形、无形的突出地位,反映了教育在中国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中的重要性。“文化”一词在权威汉英词典里有两层主要意思:一是“civilization; culture”,即“文明;文化”。二是“education; schooling; literacy”,即“教育;学校教育;识字”。^[2]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文化”和“教育”这两个概念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在我对邹平的访问中体会得

非常明显。有文化,意思就是受过教育,或者更具体地讲是已经通过读书而达到了某种文化水平。由于范仲淹和梁漱溟在中国学术界的声望,他们为邹平成为引以自豪的“文化县”作出了卓越贡献。1992年,在一份给国家教委的报告中,邹平县委和县政府正是这样介绍邹平的:“我县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也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县。”^[3]这种在地方教育或文化方面的自豪感在最近的1995年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当时邹平成为鲁西北第一个达到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标准的县,并扫除了45岁以下文盲,因此成为该县教育史上的里程碑。

这些成就使邹平20世纪的教育史,堪称以普及学校教育为代表的教育现代化的成功典范:在20世纪初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邹平儿童能入学,并且多数人只念几年书,学了一些传统的启蒙读本和“四书”、“五经”;一百年以后,几乎所有儿童都接受了九年制教育,所学课程包含完全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教育科目。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也留下了社会政治和政策剧烈变动的印迹。正如以后的章节中将写到的,贯穿20世纪的教育制度改革,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有着密切相关,并且从国家建设和政府组织的宏观方面到个人生涯的微观方面,都对邹平的社会生活有着明显的、意义重大的影响。因此多数改革都饱受争议,这些改革很少能够实现倡导者当初的设想。

第一节 中国的教育与社会政治变革

长期以来曲折的改革道路,使得中国教育制度的现代化变革颇值得人们深思。从20世纪初传统学校向现代教育制度转变的最初尝试,到一个世纪后以“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的计划,都已经证明教育改革者要实现他们的目标的确很难。问题不在于他们没有尽力去变革,实际上在20世纪教育方针已经发生了数次变

化,而且通常是戏剧性的重大变化,问题在于总有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出现,而这些因素已超出教育领域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精神方面的现实相关联。表面上看,教育存在于有序的、十分制度化的世界里:学生们整齐地端坐在教室里,一切都处于严格的行政当局的控制下,因此看起来变革似乎比较容易。然而,现实表明,教育是难以把握和不可预期的领域,在这里,国家和地方精英、集体、家庭、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一些无法预知的后果。

令教育改革者们经常如此困惑的一个原因,可以从中国传统教育在政治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中得到答案。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曾经论述过清朝末期关于教育和教育制度的争议是如何与广泛的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的问题:

学校,可能具体体现了一个社会普遍的多方面的梦想,有时政治梦想也在其中。在中国这种情况更是如此。许多精英政治与教育有密切关系,所以政治活动经常扩散到学校……因此,学校经常在政治行为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直接或间接地重新构论(retheorise)或重新构想(reimagine)着晚清政治制度的某些或所有方面。^[4]

这种重新构想常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机构,伍德赛德说明了清朝末期的改革者是如何以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为理想模式提出改革设想的。^[5]

通过教育制度的改革试图将中国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重新构想”的趋势,似乎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的始终。如果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思考改革,那么就可能弄清孤立地分析学校的社会角色时无法解释的许多现象。正因为学校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居中心地位,同时看起来如此容易被政治所左右,所以在大型社会改革方案中,教育总是首当其冲的。因此,教育改革计划是作为社会改革蓝

图的一部分,是为在政权更迭时发动大规模社会政治变革而服务的。换言之,与其说教育改革仅仅为解决知识、态度、技能的传输这类实际问题,不如说它其实总是寄托着改革者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构想,同时教育领域被赋予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是集中反映公民、社会,甚至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载体。

学生和家长当然不一定受这些宏观问题的影响,但他们同时的确会对教育制度抱着很具体的期许,因为他们深知,一个人所受教育的种类和水平影响着他或她成年后的发展机会。改革者的构想在公众中流传,并写进演讲稿、报纸文章、指示、教学大纲及课本中,然而农民对这种频繁的政治变动的反应以及他们对当地学校的期望都用一种更微妙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我们比较难以把握农民的观点。从实施阶段改革的命运来看,从改革者受挫后的抱怨来看,以及从我的访谈对象所表达的观点来看,邹平人一直对教育制度有三个基本要求:学校教育应包括基本学业技能,特别是读写方面的能力;应积极促进向上层社会流动;应有利于学生品质的培养,并教他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换言之,家长送孩子上学主要不是为振兴民族或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期望教育能使个人能力水平有更明显的提高。

一方面是使中国“繁荣富强”的构想、计划,另一方面是世俗社会流行的规范、期许和现实考虑,正是这两方面形成的作用力决定了教育改革的命运。

第二节 教育改革释义

在回到有关邹平的话题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学者们是怎样看待教育与 20 世纪中国更大范围内的变革模式之间的联系。由于中国教育方面有浩如烟海的文献著述,所以这一讨论可能不够全面透彻,但我希望能够澄清本人是从哪个角度来谈论邹平问

题的。

在新中国的历史著作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中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都被看作是教育变革背后的推动力量。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孙培青的《中国教育史》。从1991年起,这本书被国家教委定为教育方面的大学部颁教材。例如,孙对五四时期的阐述,将教育改革看作工业化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变革的结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

这一时期,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的需求,在由文学革命引发的思想解放的浪潮下,教育领域掀起了改革传统封建教育,倡导实用、科学,积极学习、引进西方的近代教育的热潮。^[6]

从这种标准解释中我看到了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是经验层面的疑点。与直觉经验相反,西方教育历史已经表明:在欧洲,国家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民众教育的普及,并不是首先发生在像英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是发生在像普鲁士、奥匈帝国和瑞典这些雄心勃勃地想扩大政府对社会影响的国家。^[7]在中国,这个问题看来更明显,因为无论是教育改革的发端、进度,还是改革方向,都与生产和经济生活发展无直接因果关系,而是更多地与政府的政治需要相关。这并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无力解释教育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需要”本身可有多种表达方式,例如,教育不再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时,那些掌控着国家机器的社会精英可以来改革教育制度。但是把教育改革或多或少地与物质生产变化直接相连的话,那么这就混淆而不是澄清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且对公众反应的解释特别不恰当。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中国历史学家历来只关注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把大量的工作集中于新教育思想和官方制定的法律